

社会网络的结构与文化：腐败问题再研究

白 锐

[摘 要] 腐败成为困扰各国的重大政治与社会难题。本文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理论,对腐败形成的社会网络结构与文化进行分析,将探讨腐败生成原因的视角转向非正式社会机制及相应文化心理形成的腐败的社会网络,而不是单纯地关注个人动机或者组织控制。本文希望回答如下问题:腐败的制度特征在哪里?为什么腐败对于公共组织机体有极大的危害?从终极意义上,我们要回答:为什么腐败对于现代社会——尤其是对于寻求现代化的国家——如此具有破坏力?

[关键词] 腐败;社会网络;结构;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0)09—0081—04

腐败现象不绝于史,东西方概莫能外,相关记录与研究不计其数。当代世界中,腐败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特色。研究表明,在社会力量与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腐败越来越普遍,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1]腐败最典型的特征以及最具危害性的特点是制度性腐败,因此腐败研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却为人忽视的议题,那就是腐败得以滋生与蔓延的以社会网络为典型的非正式社会机制。本文将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对腐败发生机制与腐败网络特征进行分析,并为治理腐败提供几点对策性建议。

一、腐败概念及其研究

(一) 腐败问题及相关研究

从词源意义上,中文的腐败意指食物的腐烂,同时指个人品性的败坏。如《新华字典》将腐败定义为“腐烂; (思想、行为) 堕落; 指制度、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2]从英文看,根据 Merriam-Webster 在线词典,英文的腐败一词 corruption 指“品质、美德或者道德原则上的败坏,以不当或非法的手段行不义之事,或背离原初之状态,背离纯粹与正确之状态。”^[3]无论是中文还是西文,腐败的基本含义是指一种良好的东西 (比如食品) 变得败坏而不可用,并把这样的含义引伸到品德上。本文对腐败的定义是,以公共职位所附带的特权、影响力或其他资源,换取个人性的利益或潜在利益。其中有两个要素,其一是涉及公权,其二是满足私利。

同许多其他的政治现象一样,腐败既关乎个人选择,也涉及到组织与社会情形。一项对中国腐败现象的研究将所有相关研究分为三类:经济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制度分析 (institutional analysis) 以及社会文化分析 (social—cultural analysis)。^[4]经济分析是对腐败问题中最明显的层面进行分析,相关领域已经有了不少论文,认为只要腐败就意味着为了私欲而滥用公共权力,无论这样的私欲是以金钱方式还是以其他回馈方式来满足,个人的理性计算是关键的原因。目前政治学与经济学者已经对腐败的个人层面作了不少成本—收益分析,基本的设想即是认为腐败的实质乃是个人理性计算,是一种政治领域的交易行为。以此角度观察政治现象,腐败经常被定义为以公共职位中的权力来谋取个人的私利。^[5]而制度分析则关注组织层面的问题,尤其是现代国家的官僚组织问题,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即是一种具备了组织特征的公共生活现象。社会文化分析的方法更为微妙也更多样化,但是结论可能引来更多的争论。对于不同文化里的腐败状况,曾经有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由于对政府官员的态度不同,以及教育水平的差异,与新教国家相比,天主教国家与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官员受到的监督更少。^[6]这个研究表明与其说是文化的影响,不如说是机制设计上导致的差异,因为新教国家与其他宗教国家本身在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上有较大的差距,政治的社会基础上差异也颇大,甚至公民文化的成熟程度也有较大差距,难以用简单的文化因素来解释腐败现象。即使是在同样的文化里,不同的制度设计也可能带来不同的反腐败成绩。根据透明国际 2006 年的调查,各国及各地区 CPI (贪污观感指数,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指数中,中国香港列 15 名,中国澳门列 27,中国台湾 34,中国大陆 70。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圈内的文化高度同质的地区,表现悬殊;此外,新加坡名列世界第 5

日本列 17 韩国 42 老挝与越南列 110 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来自文化类同的大中华文化圈。^[7]

对腐败的分析,道德、个人收益或组织分析的方法,虽触及了腐败的某些问题症结甚或地严重的问题或症结,但这些方法都回避了腐败的社会属性,将这些分析纳入社会网络分析的视野,则要全面得多。

(二) 社会网络理论

我们说一般意义上的腐败,都是指公共腐败,而不是私人道德意义上的腐化,因此毫无疑问,对腐败的根本治理来自政治领域,来自法治手段。本文论述腐败的社会基础,并非意味着回避腐败问题的政治性质,或者放弃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在于政治实践的观点——本文希望表明,腐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腐败之所以存在,是与相应的社会组织网络有相当大的关系。只有对于腐败发生的社会基础有了根本性的认识,反腐败的机制设计才有可能成功。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两个概念紧密联系。社会资本理论是布尔迪厄,科尔曼,帕特南以及林南所发展起来的。其中布尔迪厄被认为首创了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的现代概念。^[8]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学者存在的一个重大分歧在于,他将社会资本视为个体社会成员可支配的资源,其理论视角是微观的;布尔迪厄与帕特南等人则是从整体意义上看待社会资本,以社会资本为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建构要素。林南本质上认为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概念平台,在考虑到社会背景前提下,社会资本即可以被当作资源,也可以当作是显要的组织职位。^[9]因此本文认为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网络理论,本文对腐败网络社会性的分析,主要依据林南的社会网络理论构架。同时,布尔迪厄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地具有强大的解释功能,本文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仍然遵从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传统。

林南社会网络理论中有几个关键概念,这些概念乃是我们分析腐败现象时的支点。第一个概念是资源。林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深植于社会结构中为人们有目的地使用的资源”,资源指的是“物质与象征性的好处”。第二个概念是结构。结构表明的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性质与方式,也暗示了社会职位与权力对个人的分配。结构的一大特征是相对固定化的互动模式,其中既有显性的制度框架,也有暗含的交往模式。因此,社会资源实质上已经显示了社会的结构特征,社会资源本身也必须经过社会与政治实体的结构化处理。第三个概念是位置。位置指某个占有社会资源的人所占据的社会地位,不同的位置可以被交织成一个社会网络,形成社会互动。林南提及一个重要的同类相亲 (homophily) 原则,即是说人们一般喜欢和与自己有类似财产、地位或社会位置的人交往,然后形成某种团体甚至封闭式的网络。^[10]事实上,小团体确乎是社会资源得以交换得最频繁的场所,因为小团体或小集团的封闭性与交往密度令具有相似背景的人可以更轻松并更频繁地交往。

二、腐败之社会网络:结构与文化

我们现在应当看看腐败的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性特征,

以及相关的文化含义。根据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腐败被视为以公共结构中的社会资源作为投入,以换取个人的利益,因而我们对腐败的理解深度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整个投入社会资源与谋取个人利益的过程。

(一) 腐败网络的结构特征

投入社会资源的结构层面涉及到三者:资源、结构位置与团体封闭性。本研究中的腐败指的是以个人职位上的公共利益换取个人所得。在此意义上,腐败即是个人——通常是政府官员——以公职上的社会资源所作的不正当投资。此处的资源,或深植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本质上是结构化的资源,这一特点将个人的社会资源与个人性资源区分开来,后者如个人的才干或家族遗产等等。其次,资源意味着对他人有用的社会物品,无论资源指的是财富、职位、名誉还是其他好处,这些资源都是稀缺性的,一般人难以获取。对腐败者而言,社会资源最重要的特征乃是其扎根性质 (embeddedness),因为它表明,社会资源是与制度结构中的某个职位紧密相连的,是制度的产物。不同的社会中,扎根于社会的资源可能会有不同含义,但是就目前中国的政治发展状况而言,正式的制度结构都是高度紧密的,资源本质上是以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方式来分配,社会资源基本上仍然以呈金字塔型分布于社会。反过来,这样的社会结构形式又强化了资源的效用,强化了社会资源的价值,令腐败的交易更加有利可图。

位置的概念是与扎根于结构中的资源相联系的。一个特殊的位置不单单是资源的位置,也是行为主体 (腐败者) 的位置;位置同样地以金字塔形分布于政治框架中,不同的位置可以获取性质与多寡不等的资源。社会位置以一种内生的方式相互联系,从而令资源得以投入组织的运作。一系列位置相互联结形成的,是大致封闭的小团体,团体内部有大致共同的利益,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实体。就腐败而言,这样的团体非常的重要,因为腐败者之间需要共同的目标,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腐败者需要不可明言的交易渠道,而这样的渠道只能是在相对封闭的团体内部才可能形成,并最终为团体成员所用。腐败团体中,另一个结构特征是上下级之间的腐败交易。学者们观察中国历史上的腐败状况,发现大致一样的现象:地方官向京官送礼行贿,同时各级下级官员对上级也同样需要“进贡”,至于上级官员到下面视察,更是贪得无厌。因而到明朝时,“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有司公行贿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11]上下级之间的交易,更进一步强化了腐败社会网络的内部结构,并且向外扩张,在公共权力体系上,这样的扩张非常有力,浊者自然求之不得,而清者则难以自保。2009年1月,人民论坛杂志联合新浪网、人民论坛网展开干部压力调查,针对“你认为领导干部的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的问题,被调查者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所谓潜规则,正是腐败网络内部的“软制度”,即使是干部自身,也感受到这种网络的无形压力。

团体之中,封闭性或其半封闭性是最重要的特征,团体与团体之间的互动,团体与其他个人的互动,具备两个特点:其一,团体本身形成一个实体,相对封闭,并且有大致明确的目标;其二,数个这样的团体就有可能形成一个网络,只要条件有利,这样的腐败网络就可能向外扩张,形成更大的腐败网。

(二) 腐败网络的文化特征

腐败的社会基础上的文化要素,也不可小视,因为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导致腐败的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

同类相亲的原则有一个假设,认为人们喜欢与跟自己类似的人群交往。根据林南的观点,同类互动(homophilous interaction)很典型地涉及到“资源相似的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资源指的是财富、名声、权力以及生活方式”。^[12]对腐败者而言,这样的心理背景非常重要,原因非常简单:一则可以节省交易成本;二来相应地降低了风险。腐败的危害性越来越明显,政府与公民对腐败越来越敏感,因而腐败的风险较以前提高,这样的心理防范对腐败者形成的团体非常重要。就中国的腐败状况而言,类似团体涉及到家庭成员甚至大家族成员,因为一般而论,社会成员在自己的家庭当中会感觉到相对的安全,并且家庭成员会分享腐败的所得,从心理与利益上家庭成员都是依靠。此外相似的教育背景与职业经历也构成团体的心理基础,比如同学、校友、战友以及老部下等等。根据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副部级以上高级官员腐败的十项特征中,家庭特征是其中一项。此项研究是以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件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过去二十多年(1978—2002年)中查处案件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的研究。这项研究认为:“配偶(一般是妻子)、儿女在高官腐败案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的时候,家人的贪婪助长了官员的腐败行为,使得他们加快暴敛财富的速度;而有的时候,政府官员自己并不出面,而由家人通过办公司的方式把黑钱洗白。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之前的17起案件中,至少有3起有腐败高官的家人涉入;在1992年之后的37起案件中,至少有19起表明,家人在高官进行腐败行为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3]显然,这一趋势在过去15年中变得更为严重。

腐败的时间层面指的是腐败的代际效应。这仍然与传统价值观及家庭观念有关,有的人就可能为子女的未来冒极大的风险。调查发现,除了开夫妻店以外,腐败中最典型的家庭联手依次是:父子联手型(如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伙同其子李勃收受贿赂)、公媳合作型(如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与其儿媳易阳,一个弄权,一个收受“好处费”)、翁婿互助型(如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先后为六家公司办理房地产开发手续和减免地价,其女婿洗某则收取“好处费”)。^[14]原因或许可以归结如下:首先腐败者会将所有的赌注押在自己儿女上面,他们不在乎腐败的所得是否在自己这一代体现,这为反腐败工作制造了极大的障碍;其次,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形成腐败的同谋,从而相互

掩护,规避惩罚。就此而论,家庭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甚至团体网络,在家庭内部,可能形成社会资源的聚合,也形成腐败者的攻守同盟。

腐败势力不加以遏制,整个社会就会陷于腐败的体制与文化,对国家与个人的危害性自不待言。政治社会化效果最深远、最普遍的公共机构是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当腐败的价值观渗透整个社会时,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学校。父母越来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因而想方设法地将为子女谋取更多的教育资源,于是原本清静的学校开始有了腐败的迹象。据报道,已经有人大代表建议,希望重视中小学班干部产生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例如,虽然学校里班干部在形式上是由选举产生,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的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当上班干部,不惜向班主任送钱送物,那些老师选举时便为该生摇大旗拉选票。至于由老师直接指定的少先队干部,则有可能“基本都是有背景的某某子女,某某孙儿”。^[15]学校里的腐败并不一定在数目上显得惊人,但是其危险性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腐败的价值观可能通过种种成人不能预计的方式,潜入不设防的教室。

三、结论与对策

毫无疑问,腐败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显然,腐败网络对公共利益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的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16]在造成有形经济损失的同时,腐败还进一步使得公共组织异化,让本应该代表公意的组织成为个人中饱私囊的工具。腐败最为深层的后果,也是最不可见的后果,是腐败网络中存在的反社会伦理,它会撕裂社会的文化纽带,造成社会心理的分裂,腐败网络会逐渐地侵蚀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最终造成“社会负资本”。如前面已经提到,腐败的实质是将公共利益去换取私利,从而在损害公共利益的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公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信任。腐败案例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则人们就会对政治甚至几乎所有公共议题失去信心。

腐败的成因与表现非常复杂,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对策自然不是信手拈来且立竿见影的。对腐败的对策,必须是标本兼治的,既要从遏制腐败的各种危害,又要从根本上对腐败的社会网络进行清理。

迈克尔·约翰斯顿在对腐败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少遏制腐败的对策,其中对于发展中国家足资借鉴同时对国际社会亦可以有所启发的,有几种办法:其一,建构有效的政府治理机制,让公共管理制度确立起,同时还必须寻求支撑这种种“公共管理”改革的政治支援,否则其成效有可能大打折扣。其二,是针对腐败高官将黑钱送到国外洗白的做法,约翰斯顿主张国际社会建立起有效的透明机制,让黑钱洗白的过程变得至少困难起来。例如由跨政府组织金融行动小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发起的针对银行与投资经纪人的“了解你的顾客(Know Your Customers)”计划,就是要求相关机构查询了解到大笔存款的来源,杜绝黑

钱轻易地进入金融市场——尽管这个做法也受到一些批评。其三,是逐渐建立起一个强大而活跃的公民社会,随着公民空间的扩展,以及各种公民团体的形成与成熟,腐败网络的社会空间必然会被压制。即使公民团体的目标并不是针对腐败,但是公民团体的要求最终会反映到这个议题上面去。^[17]

本文已经分析,腐败——尤其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的最根本动因,在于其社会网络属性。因而治理腐败的解决办法,应当针对这个根本性的症结。对反腐败的对策,有两点设想。其一,我们对腐败问题的对策,应当尤其强调公民意识,甚至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唯有这样的发展路径,才能扩张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遏制腐败本身的社会网络;其二,最有可能见效的反腐败制度建构,是加强对腐败进行有效查处追究的机制设计,这样的制度存在,不单单是为了吓阻腐败者(前文已经分析,有的腐败者为了家人甚或为了背后的腐败网络,是不会也不能考虑自身政治后果的)更关键的是,这样的机制一旦得以有效运行,公众就会对公共组织建立起信心,社会就会逐步建构起反腐败的正面心理与非正式机制,从而积累起对付腐败——甚至对付其他社会问题——的社会资本。①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Robert Neigh. Public Corruption: the Dark Side of Social Evolution.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 PP5—19.
- [2] 新华字典 [Z].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291.
- [2] Xinhua Dictionar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1. P291.
- [3]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http://www.m-w.com/dictionary/corruption> 2007—10—10.
- [4] Lv Xiaobo. Cadre and Corruption. Pape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20.
- [5] Julia Kwo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ruption in China. Armonk, M.E. Sharpe, 1997. P24.
- [6] David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W.W. Norton, 1998.

- [7]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06. http://www.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2006.
- [8] Alejandro Portes.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ume 24, 1998.
- [9] [10] [12] Nan Lin.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4. PP26—29. P47.
- [11] 陈锋. 论中国古代的腐败与世风 [N]. 光明日报, 2003—11—25.
- [11] Chen Feng. Corruption and Social Ethos in Ancient China. Guangming Daily, 2003—11—25.
- [13] 过勇. 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 [J]. 廉政大视野, 2003 (10).
- [13] Guo Yong.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High-rank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Vision, 2003 (10).
- [14] 官员犯罪呈腐败家庭化 [EB/OL]. <http://news.sina.com.cn/c/2005-11-10/15388260795.shtml>
- [14] Public Corruption: a Family Business. <http://news.sina.com.cn/c/2005-11-10/15388260795.shtml>
- [15] 中小学班干部评选腐败现象值得重视 [N]. 中国青年报, 2008—1—30.
- [15] Student Cadres Recruitment Corruption: Noteworthy Chinese Youth, 2008—01—30.
- [16] 倪星, 王立京. 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J]. 新华文摘, 2004 (3).
- [16] Ni Xing, Wang Lijing. Measurement of Corruption in China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Outcome. Xinhua Digest, 2004 (3).
- [17] Michael Johnston. Syndromes of Corrup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6—220.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行政管理系副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杜鲁门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广州 510632)

(责任编辑 林娜)

Structure and Culture of Social Networks: Research on Corruption

Bai Rui

[Abstract] Corruption has now become a very seri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 for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paper by the use of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networks theory carries the argument of corruption into the depth of social networks and culture and turn th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ve dimension from the conventional individual motives perspective or institutional control perspective. We want to focus on what is the institutional feature of corruption? Why does corruption pose a critical damage to public organs? And ultimately why corruption is so devastating to modernizing countries?

[Key words] corruption; social networks; structure; culture

[Author] Bai Ru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hua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